

doi:10.11835/j.issn.1005-2909.2026.02.002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董森,程伟华,张斌.“双一流”建设高校理工类留学研究生导学互动关系研究[J].高等建筑教育,2026,35(2):9-18.

“双一流”建设高校理工类留学 研究生导学互动关系研究

董森¹,程伟华²,张斌³

(1.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2.南京农业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国际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3.南京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近年来,随着来华留学研究生数量的持续增长,留学研究生教育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高校“双一流”建设成效。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354名理工类留学研究生开展了基于人际环形模型的调查问卷,探讨了导学互动关系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导学互动关系以领导型为主,性别、洲别、年级、跨文化适应力对互动关系的影响差异显著;留学研究生对导学关系满意度较好,领导型、帮助/友善型、理解型的关系显著正向影响满意度,不满意型、犹豫型的导学关系显著负向影响满意度;理想导学关系的核心特征是“支持”与“尊重”。因此,针对系列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强化导师的育人理念,发挥导师全过程育人作用;二是全面提升来华留学研究生素养与跨文化适应力;三是高校健全督导监督机制与导学互动交流共享平台,营造和谐互动氛围。

关键词:导学互动关系;人际环形模型;“双一流”高校;来华理工类留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26)02-0009-10

高校留学研究生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使命,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和智力支撑^[1]。近年来,我国留学研究生数量猛增,其中理工科留学研究生占比最大,规模与增幅在各学科中占比最高。据教育部公布的历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2015—2018年来华留学研究生从53 572人增长至85 062人,且2018年理工科留学研究生占比32.6%,年均增幅达26.5%^[2]。我国“双一流”建设理工类高校是理工科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的主力军,在留学研究生教育中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3]。然而,随着留学

修回日期:2025-02-12

基金项目: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2024年外国留学生工作专项课题“个人-环境匹配理论视角下西部来华留学研究生与导师匹配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12);南京农业大学2024年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培育项目“国际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教育策略与实施路径研究”(Yjsjgpy2410);电子科技大学202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构建和谐来华留学研究生与导师关系实践研究”(ZYGX2022ZCYJ007-7)

作者简介:董森,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E-mail)dongmiao@uestc.edu.cn;(通信作者)程伟华,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E-mail)whcheng@njau.edu.cn。

研究生数量的激增,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与社会期待存在较大差距^[4-6]。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留学教育,将我国建成全球主要留学中心和世界杰出青年向往的留学目的地”^[7]。“双一流”建设目标要求留学研究生教育要“提质增效”,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国际研究生教育体系。因此,提升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已成为我国“双一流”建设理工类高校留学生教育的重要使命,也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导师与留学研究生是留学研究生教育的两大主体,是影响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两者的关系(以下简称导学关系)是研究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点。和谐的导学关系既是提升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保障,又是高校做强“留学中国”品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基础。目前,学者对导学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培养模式、管理制度、招生制度等方面,较少深入探讨留学研究生导学关系^[8-13]。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大多研究基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与构建,集中在招生、管理和教育现状分析,较少深入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微观层面;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总体上以质性研究与理论构建为主,较少对导学关系进行实证调查研究;三是在研究角度上,大多关注导师或留学研究生单方面因素,忽视了二者的互动影响过程,鲜有基于人际交往理论的导学关系研究。

导学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导师为主导、以研究生为主体,二者双向互动而形成的人际关系^[14]。早期有学者提出用人际交往理论解释人际沟通中个体行为的可能性及其对他人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Leary、Gatfield等^[15-16]提出多种人际环形模型,其中Leary的理论模型是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2006年,Wubbels等^[17]发展了Leary模型,将“亲近程度”和“影响程度”两个维度发展成二维坐标图形,组合出8类师生互动关系,提出了教师人际关系行为环形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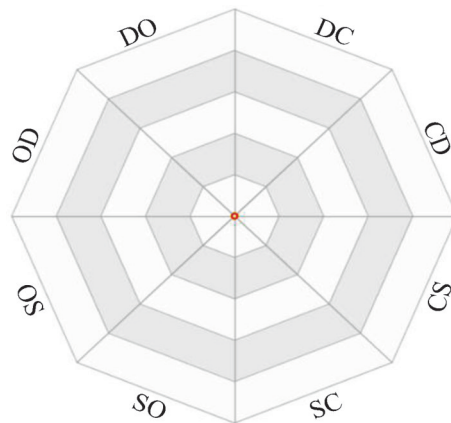


图1 人际环形模型

这一模型被应用于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有效管理研究中。2009年,在Wubbels的启发下,Mainhard开发了导师-博士生互动问卷(Questionnaire on the supervisor-doctoral student interaction, QS-DI),用于全面审视导学双方的指导过程,该问卷对了解师生的交流互动,研究导学关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18],随后问卷被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广泛采用^[19-21]。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研究了西方文化背景下留学生导学关系^[22-23]。我国学者应用该模型研究了国内研究生导学关系,包括导学关系类型、影响因素,并构建了人际视角下的导学关系类型,取得了丰硕成果^[24-29]。然而,学者并未对来华留学研究生群体的导学关系给予太多关注。基于此,本文考察了全国6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理工类来华留学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全面分析了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互动关系特征、不同来华留学研究生群体偏好的导学关系,以及导学关系特征与满意度的关系。这不仅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而且为提高培养质量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一、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

研究对象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理工类来华留学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以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6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样本。其中,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为工科类大学、南京大学为综合类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为综合性师范大学。这些高校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在工科教育方面都凸显出较强的学科优势与国际影响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433份,其中有效问卷354份,问卷有效率为81.7%。调查对象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该样本群体中,男性居多,占比76.3%;年龄在26~30岁居多,占比41.8%;博士研究生居多,占比62.1%;非洲学生居多,占比59.6%;跨文化适应能力评价好及以上的留学生居多,占比74%;样本在各年级分布较为平均。

表1 来华留学研究生人口学特征统计(n=354)

人口学特征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70	76.3
	女	84	23.7
年龄	21~25岁	46	13
	26~30岁	148	41.8
	31~35岁	81	22.9
	36~40岁	63	17.8
	40岁以上	16	4.5
学历	硕士	134	37.9
	博士	220	62.1
洲别	亚洲	125	35.3
	非洲	211	59.6
	其他	18	5.1
年级	一年级	90	25.4
	二年级	92	26
	三年级	88	24.9
	四年级	47	13.3
	五年级及以上	37	10.5
高校类型	理工类	246	69.5
	综合类	108	30.5
跨文化适应力	非常好	115	32.5
	好	147	41.5
	一般	75	21.2
	差	6	1.7
	非常差	11	3.1

(二) 问卷设计

在发放问卷前,研究团队对问卷进行了翻译和回译,并邀请部分来华留学研究生进行了预测试,以确保问卷的语义准确性与文化适应性。问卷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洲别、年级、高校类型、跨文化适应力7个变量,考察来华留学生个体因素

与导学互动关系特征。第二部分采用导师—博士研究生互动关系问卷(QSDI),考察导学互动关系特征^[18]。该部分由41项题目组成,运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每道题下设“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有些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五个选项,设置1~5分。该问卷已应用于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良好的跨文化适用性^[19-21]。第三部分采用成熟的满意度量表测量导学关系的满意度^[30],了解导学关系满意度与导学互动特征之间的关系。该部分由8项题目组成,满足了对总体满意度的均匀估计。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的分数设置为1~7。第四部分为开放问题,考察来华留学研究生认为的理想师生关系。

二、研究发现

(一) 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互动关系特征

计算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关系量表各个维度平均分,得到样本均值分布统计和导学互动关系轮廓图,如表2和图2所示。我国研究生视角下导学互动关系轮廓图如图3所示^[26]。由图2可知,从来华留学研究生视角看,导学互动关系呈现的核心特征是导师强势指导,并有一定合作的“领导型”;主要特征依次为合作程度高,导师一定程度上顺从学生意愿的“理解型”;导师指导强势程度低,合作程度高的“帮助/友善型”;导师与学生合作程度低,顺从学生程度高的“学生自主型”;导师强势指导,与学生抵触程度低的“严格型”。对比图2和图3可知,相较我国研究生,来华留学研究生感知到领导型、帮助友善型、理解型、学生自主型强度更高,感知到犹豫型、不满意型、惩戒型、严格型强度偏低。根据八类导学互动特征的平均值,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得到来华留学研究生及我国研究生导学关系的亲密程度分别为7.94分和6.69分,影响程度分别为1.50分和1.71分,其中,式(1)为亲密程度得分,式(2)为影响程度得分。因此,相较我国研究生,来华留学研究生感知导师的亲密程度更高、影响力偏低^[14]。

$$CS+SC+CD+DC-(DO+OD+OS+SO), \quad (1)$$

$$DO+OD+CD+DC-(OS+SO+CS+SC), \quad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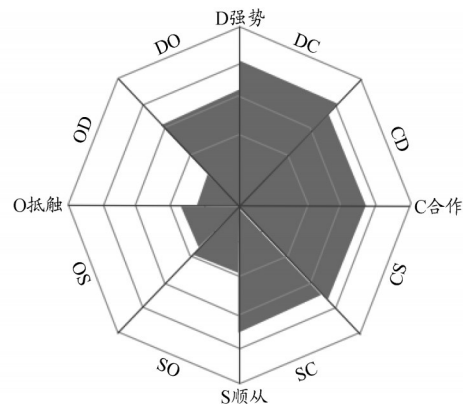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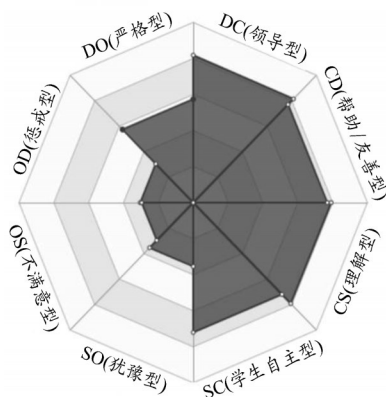


图2 来华留学研究生视角下导学互动关系轮廓图 图3 我国研究生视角下导学互动关系轮廓图^[26]

(二) 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互动关系特征差异性分析

为探究来华留学研究生个体因素是否对导学互动关系的差异产生影响,研究分别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不同背景因素(性别、年龄、学历、洲别、年级、高校类型、跨文化适应力)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互动关系特征进行均值比较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从各个维度看,不同高校类型、不同学历层次(硕士/博士)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p>0.05$);不同性别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在严格型导学互动关系中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男性比女性留学生感知到严格型互动关系强度更高;不同洲别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在犹豫型、不满意型、惩戒型、严格型导学互动关系中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相较于亚洲留学生,非洲学生感知到犹豫型、不满意型、惩戒型互动关系的强度均偏低,感知到严格型导学互动关系的强度更高;不同年级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在不满意型导学互动关系中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年级越高,感知到不满意型导学互动关系强度越大;不同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对领导型、帮助/友善型、理解型、学生自主型、犹豫型、不满意型、惩戒型导师互动关系均存在显著差异,且来华留学研究生跨文化适应越好,感知到领导型、帮助/友善型、理解型、学生自主型的导学互动关系强度越高,感知到犹豫型、不满意型、惩戒型导学互动关系强度越低。

表2 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互动关系特征均值分布统计($n=354$)

维度	平均值	标准差	维度	平均值	标准差
DC(领导型)	4.07	1.03	SO(犹豫型)	1.77	0.85
CD(帮助/友善型)	3.85	0.90	OS(不满意型)	1.48	0.79
CS(理解型)	3.96	0.98	OD(惩戒型)	1.52	0.85
SC(学生自主型)	3.60	0.96	DO(严格型)	2.87	0.82

(三) 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关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关系满意度量表,计算得到满意度均值为5.14,表明来华留学研究生对导学关系较满意。通过线性回归方法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将八种类型的导学互动关系作为研究的自变量,来华留学研究生对导学关系的满意度作为研究的因变量,数据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显示,调整后的决定系数 R^2 为0.75,表示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良好,运算结果可以真实有效地反映出变量对满意度的影响。方差膨胀因子 VIF 全部小于10,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线性回归结果显示,领导型、帮助/友善型、理解型、犹豫型、不满意型5个自变量对导学关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领导型变量($\beta=0.520>0, p<0.001$)、帮助型变量($\beta=0.231>0, p<0.001$)、理解型变量($\beta=0.161>0, p<0.05$)显著正向影响满意度;犹豫型变量($\beta=-0.111<0, p<0.05$)、不满意型变量($\beta=-0.201<0, p<0.01$)显著负向影响满意度。回归结果显示,“领导型”对应的导学关系为最高的满意度,“帮助/友善型或理解型”对应次高的满意度;“不满意型”对应的导学关系最为不满意,“犹豫型”对应次低的不满意度。基于上述分析得出如下回归方程:

$$S=1.576+0.520X+0.231Y+0.161Z-0.201M-0.111N, \quad (3)$$

式(3)中:S为导学关系满意度;X为领导型;Y为帮助/友善型;Z为理解型;M为不满意型;N为犹豫型。根据式(3),还可预测计算满意度。

(四) 来华留学研究生视角下理想导学关系特征

对调查问卷中第四部分开放问题的数据进行提取处理,关键词词云分析结果显示,“支持”与“尊重”是来华留学研究生理想师生关系的核心特征,“支持”(53次)、“尊重”(44次)、“友好”(38次)、“交流”(34次)、“理解”(30次)、“指导”(30次)、“合作”(20次)、“专业”(18次)、“信任”(18次)这9个关键词被提及的频次最高,构成了来华留学研究生理想导学关系的主要元素。

综上所述,来华留学研究生认为,理想导学关系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沟通交流获得情感(尊重、友好、信任、理解)、信息(指导、交流、合作)、工具(专业)等全方位的指导。值得注意的是,来华留学生对情感支持的需求较为强烈,这可能与理工科高校导学关系中,师生之间基于实验

室及科研项目的互动较为紧密,情感交流相对较少有关。

表3 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互动关系特征差异性分析

维度	领导型	帮助/ 友善型	理解型	自主型	犹豫型	不满意型	惩戒型	严格型
性别	-0.812	-0.323	0.232	-0.453	1.314	1.58	0.682	男性 (2.5)* 女性 (2.4)*
年龄	1.346	1.34	1.457	1.1	0.334	1.893	0.362	1.135
学历	-0.42	-1.033	-0.312	-0.136	1.345	-0.562	-0.541	-0.312
洲别	2.144	2.137	1.55	1.238	亚洲(1.74) * 非洲(1.53) * 其他(2.11) *	亚洲(1.29)** 非洲(1.17)** 其他(2.12)**	亚洲(1.41) ** 非洲(1.26) ** 其他(1.35) **	亚洲 (2.4)** 非洲 (2.3)** 其他 (2.5)**
年级	0.63	0.913	1.131	1.934	0.479	一年级(1.14)* 二年级(1.21)* 三年级(1.31)* 四年级(1.42)* 五年级及以上 (1.53)*	0.471	1.101
高校 类型	0.325	1.654	0.893	0.761	0.936	0.765	1.333	1.229
跨文化 适应力	非常好(4.1) * 好(3.6)* 一般(3.42)* 差(3.31)* 非常差 (2.81)*	非常好 (4.01)* 好(3.81)* 一般(3.1)* 差(3.3)* 非常差 (2.19)*	非常好 (4.11)* 好(3.88)* 一般(3.6)* 差(3.5)* 非常差 (2.18)*	非常好 (3.45)* 好(3.14)* 一般(3.10) * 差(3.3)* 非常差 (2.14)*	非常好 (1.40)* 好(1.35)* 一般(1.39) * 差(1.12)* 非常差 (2.01)*	非常好(1.32)* 好(1.31)* 一般(1.47)* 差(1.56)* 非常差(2.01)*	非常好 (1.23)* 好(1.21)* 一般(1.31) * 差(1.52)* 非常差 (1.51)*	1.728

注:性别、学历为独立样本T检验,表内数字为 t 值;其余为单因素方差分析,表内数字为 F 值。括弧内数据为样本平均值。“*”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p 为显著性水平。

三、结论与建议

基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理工类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关系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导学互动关系特征、来华留学研究生群体导学关系特征差异、导学互动关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理工类来华留学生的导学关系核心特征为领导型,主要特征依次为理解型、帮助/友善型、学生自主型、严格型。这说明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关系中导师掌握主动权,能够决定双方关系走向。导师能与来华留学生合作,给予其一定自主权,但对学术要求严格。此结构与我国研究生导学关系特征相似,但从影响力与亲和力维度强度对比看,来华留学研究生感

知导师亲和力强度更高,影响力强度偏低。相较于我国研究生,影响力强度偏低的原因可能在于来华留学研究生生源质量不高、基础相对薄弱,且存在跨文化差异,很难全面参与导师科研项目,导师对其学术指导的要求偏低。亲和力强度更高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导师理解来华留学生在华求学的不易,在言行上给予其更多关心与支持。根据人际交往环形理论,在影响力维度上,一方的行为可能唤起相反的行为(互补性),那么相较于我国研究生,导师对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影响力小,说明来华留学研究生对导师的依赖减少,这将不利于来华留学生培养质量提升;在亲和力维度上,一方的行为可能唤起另一方相似的行为(互惠性),那么导师对来华留学生表现出关心、理解和友善,说明来华留学研究生也可能对导师采取相似的言行,这是构建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

表4 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互动关系与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Beta	t	显著性	VIF
	β	标准错误				
(常量)	1.576	0.213		7.033	0.000	
领导型	0.520	0.045	0.450	8.110	0.000	5.910
帮助/友善型	0.231	0.058	0.156	3.402	0.000	5.002
理解型	0.161	0.061	0.151	2.262	0.014	6.091
学生自主型	0.055	0.032	0.043	1.261	0.201	2.260
犹豫型	-0.111	0.055	-0.056	-2.126	0.021	2.351
不满意型	-0.201	0.073	-0.101	-2.721	0.004	2.843
惩戒型	0.093	0.055	0.054	1.514	0.103	2.142
严格型	-0.013	0.041	-0.006	-0.310	0.731	1.341
	R^2				0.740	
	F				221.622	
	P				<0.0005	

第二,来华留学研究生个体因素(性别、洲别、年级、跨文化适应力)在导学互动关系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男性留学生感知到严格型导学关系强度高于女性留学生,这说明导师在科研指导中对男性留学生要求更加严格;非洲留学生感知到犹豫型、不满意型、惩戒型导学关系强度低于亚洲留学生,感知到严格型导学关系强度超过亚洲学生,这与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文化差异有关^[31]。非洲学生受西方观念影响,更关注“自己怎么看”,用自身价值观念评判他人的行为模式,同时非洲学生性格热情奔放,处事方式上更为随性,对严格型的言行较敏感^[31]。亚洲学生受儒家文化影响,群体观念强,更关注“别人怎么看”,较易受他人看法左右,在处事态度上认真严谨,对严格型的言行不敏感。不同高校类型和学历层次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在导学互动关系特征上未发现显著差异,这可能与研究样本量、高校选择范围等因素有关,未来可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范围,并深入探讨不同学科、不同培养模式下的导学互动关系。

第三,“双一流”建设高校理工类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关系满意度水平较高。来华留学生满意度最高的导学互动关系为“领导型”,其次为“帮助/友善型”或“理解型”;最不满意的导学互动关系为“不满意型”,其次为“犹豫型”。领导型、帮助/友善型、理解型的导学互动特征显著正向影响满意

度;不满意型、犹豫型的导学互动特征显著负向影响满意度。因此,导师应给予来华留学生更多的指导,共同开展项目合作,并给予其更多的理解和尊重,控制不满意与犹豫不决的言行,从而提高导学关系满意度。

第四,来华留学研究生认为,理想的导学关系以“支持”与“尊重”为核心特征,以“友好”“交流”“指导”“理解”“专业”“信任”“合作”为主要元素。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积极沟通交流,并提供情感、信息、工具等全方位的支持。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构建和谐来华留学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建议。

1. 强化导师的指导育人理念,发挥导师全过程育人作用

首先,导师应认识到自身的言行将对留学研究生的认知、行为与情感产生重要影响,应将知华、友华、爱华育人理念作为培养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导师应认识到相互尊重是导学关系的基础,在教学指导中尊重、关心来华留学研究生,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导学互动氛围。最后,导师在指导过程中应尊重文化差异,理解跨文化背景下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多样性,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破除沟通中的误解,形成和谐互动交流。此外,重视个性化指导,注重将学生的研究兴趣与其母国国情相结合,提供合适的科研训练计划,提高育人成效。

2. 来华留学研究生提升自身素养与跨文化适应力

一方面,来华留学研究生应充分认识不足,并对基础知识、研究能力薄弱的环节主动与导师进行交流,并参与不同类型的科研学术讲座与交流研讨会,有意识提升科研适应能力及科学研究基础能力。另一方面,来华留学生应加强跨文化适应力的实践训练,加强对中国文化、人际关系、集体与个人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导师角色认知与导学关系的理解。在项目研究的不同阶段主动及时向导师反馈自身情况,双方共同达成合理预期,并根据预期调整行为模式,以推动课题研究正常有序开展。

3. 健全督导监督与申诉保障机制,营造和谐氛围

一是健全督导监督与申诉保障机制。聚焦导学关系中的潜在问题,建立全流程督导监督体系,实现早发现、早疏导、早解决;同步构建公正客观的第三方申诉渠道,为导学双方提供便捷的维权渠道,并联动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全方位保障师生合法权益与身心健康^[32]。

二是搭建全周期导学互动共享平台。贯穿招生录取、教学培养、毕业就业全过程,强化师生双向沟通与了解,提升导学匹配度与亲和力。在招生录取考核阶段,充分发挥导师主导作用,推动导师深度参与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全流程考察,精准掌握其综合素养、科研能力及发展潜力;同时为留学研究生提供与导师充分交流的机会,助力其全面了解导师的科研方向、课题优势及培养理念。在培养过程中,积极搭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导学交流平台,鼓励开展研究生论坛、前沿研究讲座、博士生学术沙龙、学术论文撰写规范培训等各类互动活动,促进师生学术探讨与思想交流。在毕业就业环节,导师结合留学研究生的职业规划与发展需求,提供针对性的就业信息支持、行业趋势分析及职业发展指导。

三是完善导学激励与宣传推广机制。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导师、取得显著成绩的留学研究生及其典型事迹予以表彰奖励。通过校园官网、新媒体平台、学术会议等多种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展示活动,树立和谐导学关系典范,彰显培养成果。以此激发导师的育人荣誉感与责任感,增强留学研究生的归属感与获得感,着力培养大批“知华、友华、爱华”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鼓励他们将在中国高校的所学所思、所见所感转化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国际舞台上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广泛传播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 [1] 程伟华, 张海滨, 董维春. 从“规模扩张”到“提质增效”: 新时代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转型与制度重构[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8(12): 32-38.
- [2] 汪滢, 王战军. 在华工科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9(4): 65-72.
- [3] 程伟华, 张海滨, 董维春. “双一流”战略引领下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探析[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8(3): 70-76.
- [4] 程伟华, 张海滨. 新时代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机遇、挑战与思考[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0(2): 27-33.
- [5] 刘进. 来华研究生因何质量不高? ——基于结构-功能-环境的深度访谈研究[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0(12): 53-60.
- [6] 程伟华, 张海滨, 董维春.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基于学生发展理论[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9(1): 64-71.
- [7] 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18-09-10)[2018-09-10].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
- [8] 杨大伟, 高磊. 新时期高校发展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困境与举措[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7): 65-70.
- [9] 赵丽文, 林煥翔. 博士生与导师关系疏离的生成与归因[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9): 71-79.
- [10] 单凌寒, 杨昊鹏, 李叶, 等. 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指标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0, 38(3): 18-22.
- [11] 陈丽, 袁文静, 李爽. 范式转换视角下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对策研究[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8(9): 45-52.
- [12] 刘水云. 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8): 26-31.
- [13] 王扬, 刘景超, 王显凌晨, 等. 博士生导学关系影响机制与导学共同体优化策略[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2(6): 53-58.
- [14] 徐岚. 导师指导风格与博士培养质量之关系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0(6): 58-66.
- [15] Leary T. Interpersonal diagnosis of Personality[M].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7.
- [16] Gatfield T. An Investigation into PhD Supervisory Management Styles: Development of a dynamic conceptual model and its managerial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2005, 27(3): 311-325.
- [17] Wubbels T, Brekelmans M, Brok P D, et al. An 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 on classroom management in secondary classrooms in the Netherlands[J]. Journal of Pediatric Surgery, 2006, 8(3): 452-452.
- [18] Mainhard T, van der Rijst R, van Tartwijk J, et al. A model for the supervisor - doctoral student relationship[J]. Higher Education, 2009, 58(3): 359-373.
- [19] Masek A. Establishing supervisor-students' relationships through mutual expectation: a study from supervisors' point of view[J].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7, 226: 012200.
- [20] Daryoushi H, Jalali A, Karimi E, et al. Assessment of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supervisor-doctoral student interaction (QSDI) in Iran[J]. BMC Medical Education, 2021, 21: 531.
- [21] de Kleijn R A M, Mainhard M T, Meijer P C, et al. Master's thesis supervision: relations between perceptions of the supervisor - student relationship, final grade, perceived supervisor contribution to learning and student satisfaction[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2, 37(8): 925-939.
- [22] Mori Y, Inman A G, Caskie G I L. Supervis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lturation, supervisor multicultural competence, cultural discussions, and supervision satisfaction[J].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2009, 3(1): 10-18.
- [23] Wang T, Li L Y. 'Tell me what to do' vs. 'guide me through it': Feedback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s [J]. Activ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011, 12(2): 101-112.
- [24] 马杰, 别敦荣. 我国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调查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12): 81-98.
- [25] 宋晓平, 梅红. 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师生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博士研究生的视角[J]. 中国高教研究, 2012(8): 50-54.
- [26] 杜静, 王江海, 常海洋. 究竟是什么影响了导学关系——我国博士生导学关系影响因素调查研究[J]. 教育学术月刊, 2022(1): 43-50.
- [27] 潘东芳. 试论导师在留学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J]. 高等农业教育, 2013(11): 57-59.

- [28] 孔兰兰, 李新朝, 李瑾. 导师跨文化适应性指导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J]. 高校教育管理, 2022, 16(3): 68-79.
- [29] 王松, 刘长远. 跨文化沟通视域下研究生与导师关系质性研究[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0(6): 20-27.
- [30] Larsen D L, Attkisson C C, Hargreaves W A, et al. Assessment of client/patient satisfaction: Development of a general scale[J].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1979, 2(3): 197-207.
- [31] 宋会玲, 江西师范大学非洲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适应研究[D]. 江西师范大学, 2018.
- [32] 董森, 李傲. 来华理工类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西部某高校为例[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44(5): 551-556.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ir supervisor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of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DONG Miao¹, CHENG Weihua², ZHANG Bin³

(1.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hool of Cyber Securit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P. R. China; 2.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P. R. China; 3. School of Overseas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P. R.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coming to China, international graduate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graduate education, which bear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ies'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354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in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based on the interpersonal circle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present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leadership, and gender, continent, grade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relationship. Graduate students have a good satisfaction with the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of leadership, helpfulness/friendliness and understanding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atisfaction, while the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of dissatisfaction and hesit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satisfaction.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deal mentoring relationship are support and respect.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implement the role of whole process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s, establish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interactive exchange and sharing platforms to create a harmonious interactive atmosphere.

Key words: supervisor-student relationship; interpersonal ring model;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责任编辑 邓云)